

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

◎毛瑞方 著

WangZheng Yu
WanMing XiXue DongJia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

◎毛瑞方 著

WangZheng
WanMing
DongChe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毛瑞方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617-8440-2

I. ①王… II. ①毛… III. ①王徵(1571~1644)—生平事迹—汉、英②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明代 IV. ①K826.1
②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660 号

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

著 者 毛瑞方
项目编辑 曹利群
审读编辑 陈 才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440-2/K·342
定 价 3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伟哉文定公，挺出明之季。维时国难亟，安攘为要计。”“天主教东来，传之自郭利。俗子狃于习，难免瞠目视。公独发信愿，有若羊枣嗜。以公识宏朗，绝非漫取弃。人心尽陷溺，儒佛总虚伪。海外寻大药，庶可起聋跛。”^①这是陈垣先生上世纪 30 年代为纪念明末天主教儒臣徐光启去世 300 周年时所赋诗句。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叩开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中西两大异质文化的相遇和初识。以徐光启为首的中国士大夫为挽救明季国势日下的颓势，从“海外寻大药，庶可起聋跛”的目的出发，勇敢地接受西来的新知识与新思想，从而推动了中西文化之间相识与对话的进程，展现了一幅瑰丽多姿的历史画卷。梁启超将此看作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场大公案”，看作是影响明末以后中国三百年学术史的几大机兆之一^②。

于是，明末以降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一直深深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自 20 世纪初叶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由开拓、沉淀到繁荣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视域也从不同角度的转换发展为全方位的多元研究格局。

首先，肇始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开拓阶段的焦点。陈垣先生因其在 1917

① 陈垣：《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五十韵》，《陈垣全集》第 22 册，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1—552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1 页。

年出版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及此后的相关成果,而被视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创者。在陈垣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四十余种论著中,绝大部分是关于明末清初基督教史的内容,其中如《基督教入华史》中的明清二节,如《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以及对中国基督教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王徵、金声、许瓚曾、吴历,对基督教著作《名理探》、《辩学遗牍》、《灵言蠡勺》、《主制群征》的研究等等。^① 受陈垣基督教史研究影响较深并以私淑弟子自称的方豪,也在此期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 1944 年结集出版为《中国天主教史论丛》^②。

此外,在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方面,也有不少学者投入了相当的力量。马相伯、陈垣都曾编辑、重印若干基督教书籍和史料。冯承钧翻译出版了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的部分内容^③。徐宗泽则以书目的形式,编撰《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用以介绍入华传教士译述的成就^④。

此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特点在于以文献为基础,通过考证史实,贯通历史和描述人物,其重视实证的方法,仍有清代乾嘉考据的遗风。当然,这些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忽略了对事实的分析和诠释。例如,被陈寅恪认为是中国宗教史创始人的陈垣^⑤,在他的明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就很注意宗教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他在《中国基督教史讲义目略》中开列的“名士攻教”、“明季教徒之事功”、“名媛奉教之诚笃”、“名士晚节信仰之疑问”、“尊孔敬祖之争议”、“综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天主教前盛后衰之总因”等纲目和细节中^⑥,可见其研究已不仅限于基督教的传播过程,而是关注到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并从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象进行了必要的阐释。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以基督教在华史为焦点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为后续的展开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厘清了基本史实;同时,在研究方法和问题取向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此时期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积累和研究也逐渐开始,其中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方豪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丛》^⑦等是较突出的代表。

1949 年至 1978 年这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沉淀时期。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风气的影响,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等问题的研究几乎陷于沉寂。

① 参见《陈垣全集》第 2 册。

②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

③ 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

④ 上海中华书局 1949 年版。

⑤ 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0 页。

⑥ 《陈垣全集》第 2 册,第 445—455 页。

⑦ 上述编著分别由北平辅仁大学 1930 年出版、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出版、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4 年出版。

许多学者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成果,沉淀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喷发。此时期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对明末西学东渐的性质和意义的讨论上。1958年,肖篁父发表文章,批评以往对明末欧洲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积极作用的评价,认为这是迷信洋人的伪科学^①。接着,朱谦之撰文提出“大坏事变大好事”的观点,反对肖文看法。他认为,对待科学的文化交流,不能以狭隘的爱国主义简单否定^②。随后,乌恩溥又对朱文进行批驳,指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并非好事,而是殖民国家有组织有计划侵略活动的一部分^③。这场争论以朱谦之的暂时沉默而告一段落。本期对明末西学东渐问题研究较为透彻的论述,当属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一章^④。此章以丰赡的资料和细致的诠释,从价值判断上论证明季“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进而指出来华耶稣会士是“科学的敌人”,他们的活动“妨碍了近代科学的输入”。不过,作者又把传教士的活动和向他们学习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历史作用区分开来,认为“徐光启一辈人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他们的努力“是起过进步作用的”。显然,这种一正一反的明显区分和评价在逻辑上颇为勉强,不过上述论断符合了当时主流意识的基本倾向。

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真是到了一个多元研究、百花齐放的境地。鸟瞰30年的学术进程,大致可以看出其中渐次演进的发展轨迹。首先是拨乱反正的春风,吹散了禁锢学界思想的阴霾。基督教入华史重新成为研究的主题,出现了陈申如、马雍、林金水等一批重新评价明清传教士和入华西学的论文^⑤,为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生机。其次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浪潮,带动了一场关注西学东渐、文化比较的广泛讨论。其中仅在1990—1995年间,关于明末清初基督教与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就有22本专著和超过150篇的论文发表^⑥。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留学、访学人员的不断增多,国际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新资料和新观念的流通,新的诠释方式和价值判断体系催生了大批原创性论著,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日臻完善。

近30年的研究,可谓新著迭出、不胜枚举,对此恐怕任何一种评述方式都有挂

① 肖篁父:《粉碎迷信洋人的伪科学》,《新建设》,1958年,第9期。

② 朱谦之:《关于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③ 乌恩溥:《十六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新建设》1960年,第3期。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9—1290页。

⑤ 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马雍:《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林金水:《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⑥ 张先清:《1990—1995年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6期。

一漏万之嫌。不过,如果尝试着条理一下这 30 年的重大突破,则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是史料的整理和翻译大大增加。其中如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1989)、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1998)、曾德昭《大中国志》(1998);冯承钧译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995);耿昇译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199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1995),以及大象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上中下)、《中国新史》、《中国近事报道》等。台湾及海外学者整理编辑的中文文献则有方豪编《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下,1998),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和《三编》(1982),钟明旦等主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1996)、《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汇编》(2002)。这些文献的翻译、整理和出版,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二是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关海外汉学史的研究论著即相继出现;进入 90 年代,海外汉学研究兴起高潮,由学者领衔或由出版社组编的各种“海外汉学丛书”、“海外中国学丛书”或“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不断涌现,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另有一批以汉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季刊纷纷出版。上述丛书和集刊的出版,除了为海外汉学史提供丰富资料外,也包含了不少汉学史研究的论著。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西平的几部关于西方汉学史的专著^①,这些专著不仅凝聚了作者 20 年间对西方汉学史研究的成果,而且提出了许多旨在推动海外汉学史学科建设的真知灼见,如主张以“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的分期;主张把西方汉学史放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历史总体中研究,重视双方的互视和互动;主张研究西方汉学要从其认知和想象的两个维度去把握等等,皆是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三是关于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纵深研究。这方面的大量论著,择要言之,有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1994)、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1996)、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余三乐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2001)、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和《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2003)、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3)等。黄一农的大批论文和他的名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05),则凸显了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地位。该书以史料的翔实、考证的精密、持论之平允令人信服,尤其是从本土反应的视角,深入考察了明季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在面对西学与中学的冲突时,如何调适“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张力,融会中西文化的过程。这种研究特色反映

^① 张西平:《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版;《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 2009 年版;《东西流水终相逢》,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了本领域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华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摆脱了单纯的宗教史研究的局限,从而融进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艺术史等广阔的区域。

四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进入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考察。30年来,有关西学东渐的论著层出不穷,张国刚的《中西文明的碰撞》(1996)、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2001)、卓新平主编的《相遇与对话》(2003)等著作引人关注。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开辟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影响的新主题,由此保证了文化双向交流研究的完整性。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999)、乐黛云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2006)是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著述。在中学西传中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确立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是这种研究取向的显著意义。

梳理近30年以至百年间对明季以降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脉络,上述林林总总的大部分内容是毛瑞方博士和我在考虑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所作的学术史回顾。面对这些丰厚的学术积累,我们同时意识到,更多地发掘原始资料,更多地研究中国教徒,特别是中下层奉教者,更多地开展个案研究,应是拓展相关领域的重要途径。

瑞方博士的《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一书就是本着上述考虑,最初以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撰成的。选择王徵为研究对象,正是希望通过一个个案的深入研究,从细节上更客观、更细致地了解晚明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了解中西文化初遇时二者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此外,针对以往研究外来传教士的多,研究中国教徒的少;研究中国教徒“三大支柱”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的多,研究其他教徒的少等现象,以王徵为研究对象可以凸显其特殊意义。这是因为,相对徐光启等中央官吏而言,王徵久居乡里,晚年才出任下级官员,他接受和传播西学的民间色彩甚为突出,有利于更多地了解西学东渐进程在社会中下层的状况。迄今看来,本书的选题仍是具有前沿意识的。

《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正是沿着这样的学术思路,在吸取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从王徵与西学东渐互动关系的角度,系统地展开论述,以求揭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和得失,为当代社会提供有益借鉴的。本书的主要建树和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申述:

第一,全面考察了王徵在晚明西学东渐过程中接受和传播西学的重要贡献和影响。自陈垣先生撰写《涇阳王徵传》以后,相继发表关于王徵研究的论著也不少,然而或重于记叙生平事迹,或着眼其科技成就;而本书则以王徵的生平与著述为基础,从王徵与西方天主教、与西方语言学、与西方科技等几个方面,全面、深入地阐述他的实践和思想,总结他在深厚的中学基础上会通中西文化的显著特点。从上

述学术意义而言,本书是系统研究王徵历史地位的第一部专著。

第二,在具体的分析中,作者通过创新性研究,弥补了以往王徵研究的不足。一是着力探讨王徵在政治思想、儒释道信仰、中文语言根基及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兴趣等中学修养,因为只有如此,方能深刻阐明王徵在中学基础上会通西学的曲折过程和具体事实。二是详细考察王徵构建教堂、创立仁会组织等一系列传播天主教的社会实践活动。三是通过严谨考证,厘清在撰写《西儒耳目资》过程中,王徵与金尼阁合作的内容及王徵独撰的内容,纠正了以往将《西儒耳目资》的创作仅归功于金尼阁的说法。四是介绍和分析了王徵在《奇器图说》之外,撰写的《诸器图说》、《额辣济亚脩造诸器图说》、《诸器图说小稿》、《藏器图说小稿》、《守御器具图说》等几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而这几部著作都是以前的研究所忽略或交代不清的。

第三,深入挖掘王徵在天主教、语言学、科技等领域会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从思想层面上深化对王徵的研究。思想是理性认识的结晶,文化交融只有上升到思想层面,才能真正结出硕果,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作者钩稽史料,阐幽发微,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阐释了王徵如何以儒学的“天人”、“仁爱”命题和“体用”架构,融入天主教的基本诫命,形成以“畏天爱人”为核心的天主教思想;会通中西语言学而形成的语言学概念和翻译理论;综汇中西科技理论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工程学学科理念,以及重视科技的经世致用思想。由此深刻说明了他会通中西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作用。

第四,通过对文献的广泛搜求和详密考辨,为相关论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科学保证。本书除利用大量中文、外文文献,以资料翔实见长外,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辨上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王徵的著述作详密梳理和考证。王徵一生著述宏富,目前虽已有李之勤整理的《王徵遗著》刊行^①,然集外的散篇逸文仍不少。作者经调研和考证,条理了王徵著述的所有书目和篇目,并分别就现存、亡佚和待寻等情况做出说明,这不仅为进一步辑佚王徵的遗著提供线索,也为将来全面整理编纂《王徵全集》打下了基础。二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如论述王徵创立天主教仁会时,从天主教文献中发现了王徵撰写的仁会“会规”;又如,论述王徵的科技成就时,从《忠统日录》中发现了以往被研究者忽略的王徵著作《守御器具图说》。通过对这篇文献的辑录和分析,说明了王徵在另一个科技领域中的新贡献。

本书将王徵会通中西文化的贡献放在晚明西学东渐的历史总相中加以阐释,并对王徵研究的时代意义作出了理论概括,从而清晰地回答了“王徵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王徵会通中西的贡献对当今的文化进程有什么启示”等问题。从学术

^① 王徵撰、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史的角度来看,其实,王徵的历史形象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诠释的。在明清时期,王徵在碑传文献中被强调为忠臣义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科学意识的觉醒,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他的科技成就,于是王徵作为科学家的历史形象被逐步树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升温,王徵又被称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本书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以往成说的重复或整合上,而是站在时代的新高度,以具体的史实和缜密的分析,重塑了王徵“跨文化传播者”的历史形象;并将此立意作为全书的主线,贯穿于各个章节之中,从而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我以为,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既有具体的历史阐述,又有抽象的理论升华。这是本书突出的特点,也由此反映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

我与瑞方博士相识已近十年,她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就表现出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极大兴趣,娴熟的外文水平为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其硕士论文《七千部西书入华与〈北堂书目〉》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进入博士学位攻读阶段后,她为本书的撰写,先后赴台湾辅仁大学访学,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留学。她一边搜集天主教史料和相关外文文献,一边撰写论文。人地生疏,备尝艰辛,但她专心治学,以加倍的勤奋如期地完成了学业。天道酬勤,《王徵与晚明西学东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时,得到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爱生活又能耐住寂寞,在学术追求上精进不已、视野开阔是瑞方博士这一代学人的可贵品格。瑞方聪慧敏求,风华正茂,我相信她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必能大有作为。“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谨以此与她共勉。

瑞方博士的学位论文经反复修改,即将付梓。遂赘述如上,聊为序焉。

周少川

辛卯正月写于瑞雪初至



前言

中国历史上的晚明时期,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耶稣会传教士东来,揭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规模接触的序幕,成为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可书之事。晚明中西文化交流是一次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既包括“西学东渐”,也包括“东学西渐”。“西学”是指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西学东渐”指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及其本土化、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将西学文献带进中国,中国士人对西方文献和文化的學習、批判性接受和吸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士人王徵就是晚明西学东渐中贡献较多的一个代表人物。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①,生于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考进士九搏乃第,曾任广平府、广陵府推官。他自少关心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喜读兵法战策,潜心机械制造。四十多岁开始与东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1571—1618)、金尼阁(Nicolas

^① 冯庚修等纂:《重修鲁桥镇志·地理志》,西安精益印书馆1923年版。第12页:“鲁桥镇属泾阳县,在县东北乡40里,距三原县正北10里,当延榆一带之卫”。今属三原,尖担堡现名王家堡。

Trigault, 1577—1628)、汤若望、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方德望(Etienne Faber, 1598—1659)等往来,相互讨论学术,交情甚笃,过从甚密。一生著述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宗教、政事、诗文、语言和机械制造 5 类。综观其一生,王徵在中学、西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在西方宗教、语言学、科技的研究与传播方面独具特色。可以说,王徵生活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碰撞和融合初期,思想上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碰撞,他的痛苦和快乐、绝望与希望交织发展过程生动地呈现了当时那批中国士人从客观感受东来西学的影响到主动吸收、传播西学的历史过程。

本书将以王徵与西学东渐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王徵与西方天主教、西方语言学和西方科技的互动关系为核心问题,考察王徵在晚明西学东渐过程中接受与传播西学的具体实践和会通中西的思想,并总结他吸收与传播西学的突出贡献和影响。这样做至少在深化王徵研究、帮助理解明朝末年西学东渐的具体历程和增强中国天主教史和天主教文献研究方面有所探索和推动,亦将通过王徵个案研究,揭示晚明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具体过程和得失,为当代社会正确处理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徵研究从明朝末年至今基本没有间断,总的来讲,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对其生平事迹进行研究,基本廓清其一生的主要事件;对其论著进行搜集、整理,从其七世孙王介搜罗王徵遗著开始,到民国时期柏堃、方豪、李宣义对散篇的收集,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李之勤编辑的《王徵遗著》,都是搜集、整理王徵论著的标志性的工作;另外,对于王徵著述和他的学术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像王徵译著特点、王徵科技贡献研究、王徵天主教信仰初探等。总的来讲,王徵研究趋势是从生平死节研究转向多元化学术研究。充分研究王徵的中学修养和政治思想,并从“会通中西”的角度,历史地考察王徵是如何经历、接受、改造并传播外来文化,是 21 世纪王徵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相对于徐光启等中央大吏而言,王徵久居乡里,晚年才出任地方官吏,其研习、传布西学的民间色彩更为突出。考察王徵的中学修养,贯通王徵在各个领域吸纳和传播西学的实践,发掘其“会通中西”的思想在晚明西学东渐中的作用,在总结王徵以往历史形象的基础上,将其定位在“文化传播者”的角度进行讨论,将不断拓宽和深化王徵研究。

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伴随着天主教传来的欧洲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始终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除了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略有影响外,并没有被中国文化所收容。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以传播天主教思想为目的而顺之带来的“西学”,具有其独特之处。第一,相对于以往的佛教文化而言,其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

长;第二,其原型是宗教、政治、科学、哲学的复合体,也不像佛学那么简单;另外,晚明的“中西会通”,是中国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双向文化选择、两种异质文化相互认同的过程。王徵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也像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一样,在寻找中国与西方文化共同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融合西方学术文化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学术和实践上的努力。例如,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在中国机械制造、语言、拼音、天文历算、地理地图等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通过儒家经典文献解释天主教信仰,将西方文化因素糅合到自己的著述之中,揭示两种思想文化的共通之处,以取得二者结合的理论根据。虽然,这些努力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融合另一种文化漫长过程中不起眼的一步,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是拓荒性质的。王徵译撰西方文献的过程,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信息间的传递过程,只是传播者所选择的符号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王徵译撰活动及其内容的个案研究,具体考察这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传播中的文化换码是如何完成的,不仅能更好地总结文献译撰与文化传播相互影响的一般规律,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细节和曲折历程。

基督教研究在我国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初步探索、圣经翻译与研究、史料文献的积累、民国年间的广泛争论以及西方神学、哲学、伦理学、教会史的翻译与介绍几个不同阶段,为后人的研究作了准备。1949年至1978年基督教研究大多以“教案”为中心。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基督教研究逐渐呈现出学术繁荣的景象。研究成果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中国基督教史概略、断代史、反教与护教历史、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历史人物、来华传教士和传教组织、中国基督教史有关资料的翻译、整理,等等。

但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人物研究中,就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研究来讲,研究成果多见教内“三大柱石”,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的研究。而仅晚明时期,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历史人物至少还应该有十人之多,如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燾、孙元化、王徵、韩霖、段衮、金声、瞿式耜等。可见,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大空间。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王徵这样一个一生与天主教传播和天主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天主教学者,可以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人物的研究补充新的内容。

此外,王徵一生著述很多,根据清朝嘉庆年间他的七世孙王介所记,共“有数十种,累百万言”。但散失非常严重。经过粗略爬梳,王徵现存论著86种,已佚33种,共119种。这些王徵遗著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对于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是本书写作前期和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王徵的大量论著是在他接触西方天主教、受洗为教徒之后创作的。其中,除了专门的天学专论外,其他类型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包含天主教思想。因此,他的论著有相当一部分可被视为天主教文献。对

于王徵这些论著的产生过程、主要思想以及个别重要论著的重点研究可以为天主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当今中国处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也不断面临各种外来文化。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持其民族性,如何理性地对待外来文化,已成为现实的、重要的课题。王徵面对异质文化时,一方面解放思想、勇于开放,一方面不盲目反对传统,理性审视和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为当今中国更好地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与方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那么,本书的研究起点怎样?

以往的王徵研究按照不同时间阶段及其特点可以被划分为传记生平与表彰死节的第一阶段、整理遗著及开始关注王徵学术的第二阶段和多元化王徵研究的第三阶段。其具体情况如下:

晚明至清末以传记生平及表彰其死节为主的撰述,是研究王徵的第一阶段。参与其中的人物有王徵的家人和慕其气节的文人志士:如晚明时期王徵的表弟张炳璇、清代王徵的七世孙王介;清代学者屈大均、卢前、查继佐、王存厚、方苞、万斯同等。张炳璇的《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金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①是王徵研究的最早史料,主要描述了王徵去世的原因和情形,简略地介绍了其先世、简谱、妻妾子侄。晚明时期三原县令张缙彦的《金宪王端节公墓志铭》就是根据它写成的。最后,作者还增加了自己的评论:“铭曰:与其馁于德也,宁馁于身;与其寿于身也,宁寿于名。身则陨之,名则腴之。其丘以土,既安既固,后人睹。”^②这两篇文章在民国早期被柏堃收入《王端节公遗集》后,不断为后人引用。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王徵传记,如屈大均的《泾阳死节王徵传》^③、查继佐的《王徵传》^④、万斯同的《王徵传》^⑤、王存厚的《王徵传》^⑥、方苞的《书泾阳王金事家传后》^⑦,内容也大都源于上述传记与墓志铭。王徵的七世孙王介作有《读明史甲申之变先端节公殉国略述梗概百韵》^⑧,以100句七言律诗的形式对王徵殉国的经过进行描述,言简意赅,读起来朗朗上口,颇具其先祖善诗言事之风韵。除此之外,王

① (明)张炳璇:《王端节先生传》,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1—215页。

② (明)张缙彦:《金宪王端节公墓志铭》,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39页。

③ (清)屈大均:《泾阳死节王徵传》,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6—217页。

④ (清)查继佐:《王徵传》,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5—216页。

⑤ (清)万斯同:《王徵传》,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7—218页。

⑥ (清)王存厚:《王徵传》,李之勤辑《王徵遗著》,第323页。

⑦ (清)方苞:《书泾阳王金事家传后》,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8—219页。

⑧ (清)王介:《读明史甲申之变先端节公殉国略述梗概百韵》,李之勤辑《王徵遗著》,第330—337页。

介创写《鲁桥镇志》^①,另著有《正学斋文集》^②。他的工作开王徵遗文收集先风,也为我们保留了王徵相关著作的重要资料线索,功劳甚大。直至清末,黄节发表《王徵传》^③,除了描述王徵死节,着重介绍王徵从西儒所学习的技艺之学。这标志着王徵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行王徵死节以外生平事迹的研究,注意到王徵著述的学术意义,也成为开始专门搜集、整理、研究王徵遗著的先声。

民国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以搜集整理王徵遗文为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柏堃、陈垣、方豪、李宣义、张鹏一等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柏堃主持泾阳县志局工作时,仿照他的老师贺瑞麟修三原县志的先例编辑了《泾阳文献丛书》^④,共24册,收录了泾阳学人的作品、与泾阳史地人事有关的诗文和泾阳先贤的遗著。这些著作中包含很多王徵遗著,第1册就是王徵的《王端节公遗集》。王重民的《跋王徵的〈王端节公遗集〉》^⑤对《王端节公遗集》编辑原因、成书过程、内容比对做了介绍和研究。可以说,《泾阳文献丛书》为王徵研究提供了集中而可靠的文献保障。

张鹏一的《明天启壬戌科泾阳王端节公会试朱卷跋》^⑥中则交代了他得见朱卷的过程、卷首字的含义、考官情况、阅卷评卷规则、试卷中首场第2、3题和第2场论题及其应答佳句、此年进士名单等内容。因为王徵当年会试朱卷早已不存,这篇跋语显得格外珍贵,成为我们了解王徵当年参加会试情形的依据。

陈垣的弟子李宣义亦着力搜集王徵著述。李宣义的《王徵著述遗版搜辑序略》^⑦介绍了王徵著述《客问》、《兵约》、《土约》、《学庸书解》、《忠统日录》、《两理略》遗版的情况,罗列各个遗版的名目、内容、著述、篇数;他还搜集到王徵的《题崇仁书》、《龙桥名议》、《清北创建温恭毅公缮城祠碑记》、《温恭毅公像赞》;他建议将王徵的遗著汇刻成书;他还撰文《吕天斋先生藏王端节公诗文目》^⑧,列王徵文、诗、曲和对联四部分共24条目录。这些遗著除了《感怀南香子八阙》这首曲之外,其他后来都被李之勤收入《王徵遗著》。另外,李宣义撰《王徵所制奇器辑佚》^⑨一文,列出

① 冯庚修等纂:《重修鲁桥镇志》,西安精益印书馆1923年版。

② 柏堃编辑:《泾阳文献丛书》第2册,1924年版铅印本。

③ 黄节:《王徵传》,《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19—224页。

④ 柏堃编辑:《泾阳文献丛书》,1924年版铅印本。

⑤ 王重民:《跋王徵的〈王端节公遗集〉》,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95—298页。

⑥ 张鹏一:《明天启壬戌科泾阳王端节公会试朱卷跋》,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33—237页。

⑦ 李宣义:《王徵著述遗版搜辑序略》,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300—310页。

⑧ 李宣义:《吕天斋先生藏王端节公诗文目》,《上智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第149页。

⑨ 李宣义:《王徵所制奇器辑佚》,《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3期,第139—141页。

其所见到的 24 种奇器的名目及其用式。这些工作都为王徵著述的搜集积累了更多内容。

这个阶段,上智编译馆确实打算编辑《王徵遗书》,因为 1936—1938 年之间,向达在欧洲采访遗著的过程中,将王徵译著中关于天主教的 4 部书,即《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崇一堂日记随笔》和《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抄写回来,宋伯胤为之汇校,王重民为之作序,经方杰赞助,本打算印行,却最终未果。这是近代学者对王徵遗著中准备专题整理刊行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没有实现,但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借鉴。

除了文献的搜集,这一阶段的王徵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对王徵遗著进行整理、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王徵著述的学术意义。首先,陈垣的《泾阳王徵传》^①在内容上与前面诸传已有本质不同。这篇文章除了对王徵生平事迹有较为简单而完整的介绍外,主要交代了王徵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和王徵的著作。

1944 年逢王徵逝世 300 周年,方豪在重庆创刊《真理杂志》,并在第 1 卷第 2 期上设王徵纪念专辑。这个专辑中除转载陈垣《泾阳王徵传》外,发表了时任西南联大机械系主任刘仙洲的《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②、存交的《读晚明泾阳王徵所著〈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手稿录后》^③、前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真理不灭,学术无国界》^④、方豪的《孙元化手书与王徵交谊始末注释》^⑤等文。从此,对于王徵学术贡献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涌现。惠泽霖著、景明译的《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⑥也是应方豪之请所作。惠泽霖当时作为北堂图书馆的负责人,正在对北堂所藏西书编目,应该是最了解王徵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以下简称《奇器图说》)所用西学文献情况的人,其所言应是客观、准确的。这一时期对于王徵科技贡献的研究论文,还有刘耀黎的《奇器图说作者续制之未刊稿》^⑦、陈胜昆的《机械工程先哲王徵先生》^⑧和王燮山的《17—19 世纪中叶我国出版的两本有关力学著作》^⑨。后者所介绍的两部著作之一,就是王徵的《奇器图说》。

① 陈垣:《泾阳王徵传》,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 224—227 页。

② 刘仙洲:《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 239—256 页。

③ 存交:《读晚明泾阳王徵所著〈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手稿录后》,《西北论衡》9 卷第 7 期,1943 年。

④ 邵力子:《真理不灭,学术无国界》,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 314—318 页。

⑤ 方豪:《孙元化手书与王徵交谊始末注释》,《真理杂志》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⑥ 惠泽霖著、景明译:《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 256—263 页。

⑦ 刘耀黎:《奇器图说作者续制之未刊稿》,《西北文化》第 17—18 期,1945 年。

⑧ 陈胜昆:《机械工程先哲王徵先生》,《陕西文献》第 24 期,1976 年。

⑨ 王燮山:《17—19 世纪中叶我国出版的两本有关力学著作(〈远西奇器图说〉,王徵译;〈重学〉,清末李善兰译)》,《物理学报》1958 年第 5 期。

关于王徵诗文的研究有方豪的《王端节公和陶靖节归去来辞跋》^①、《了一道人〈山居咏〉笺证》^②、《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③，李宣义的《〈山居咏〉校记》^④和《王徵河渠叹签释》^⑤。

王徵宗教信仰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宋伯胤的《从〈山居咏〉看王徵的思想和信仰》^⑥在题目中第一次鲜明提出了王徵的“信仰”，并对此而作研究。但文章只是从《山居咏》中找到一些文字列举于后，并没有进行分析评论。随后，他的另一篇关于王徵信仰的文章《王徵的“天学”与“儒学”》^⑦认为，王徵是从儒家哲学探讨并理解天主教的。

随着这些工作更多地展开，王徵研究随后也就进入另一个阶段，即对其学术进行多元化研究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些年，王徵研究进入多元化阶段，研究涉及王徵遗著、王徵年谱、王徵与机械工程、制图、教育思想、翻译、设计思想、宗教、音韵学、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学术领域。

大通的《王徵——明代爱国爱教的天主教学者》^⑧，从王徵本人著作以及他人著作中辑有关史料，论述了王徵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史实和对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宋伯胤的专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⑨，对王徵的科学成就和宗教信仰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陈俊民为增订本写序《王徵的历史世界与神哲学追求》，再次肯定了王徵的神哲追求和他的学术贡献一样重要，甚至比学术贡献更重一筹。这篇论文后来经修改，以《“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⑩为名发表。之后，大家对于王徵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的思想意义更加重视。比如，内地学者杨瑾的《明代翻译家王徵与外国传教士》在探讨王徵译著的同时，从宗教的角度考察了王徵与同时代传教士的来往活动；台湾学者黄一农的《晚明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

① 方豪：《王端节公和陶靖节归去来辞跋》，《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

② 方豪：《了一道人〈山居咏〉笺证》，李之勤辑《王徵遗著》，第301—302页。

③ 方豪：《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3期，1964年。

④ 李宣义：《〈山居咏〉校记》，《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4—5期，第308—319页。

⑤ 李宣义：《王徵河渠叹签释》，《益世报》（1947年6月11日）。

⑥ 宋伯胤：《从〈山居咏〉看王徵的思想和信仰》，《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82—287页。

⑦ 宋伯胤：《王徵的“天学”与“儒学”》，《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第288—295页。

⑧ 大通：《王徵——明代爱国爱教的天主教学者（纪念王徵逝世350周年1644—1994）》，《中国天主教》1994年第6期，第33—36页；1995年第1期，第42—43页；第2期，第40—42页。

⑨ 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 陈俊民：《“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第16—26页；第4期，第121—128页。